

37-46

## 俄羅斯東方學和漢學史上的斯卡奇科夫

Petr Emeljanovich Skachkov in the History of  
Orientalism and Sinology in Russia

柳若梅 (Liu Ruomei) \*

## 一、前言

彼得·葉梅里亞諾維奇·斯卡奇科夫 (Петр Емельянович Скачков, 1892-1964) 是俄羅斯 1932 年出版《中國書目》(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Китая) 以及 1960 年出版的《中國書目》增訂本的編者和《俄羅斯漢學史》(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的作者。正如俄羅斯科學院漢學家協會主席米亞斯尼科夫 (В. С. Мясников) 院士所說, 無論俄羅斯人想在漢學領域做哪方面的研究, 在準備階段, 每當人們想瞭解漢學某一領域已有的成果時, 都會從斯卡奇科夫的《中國書目》中得到巨大的幫助, 在數十年的時間裏, 這部著作一直是那些新的名著問世的獨特起點。<sup>1</sup> 除編輯、增訂《中國書目》外, 斯卡奇科夫還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喀山以及其他城市的檔案館的成千上萬份手稿、檔案、年表中認真爬梳, 總結俄羅斯漢學 200 多年的研究, 撰寫了《俄羅斯漢學史》一書。為國際漢學研究領域做出了貢獻。斯卡奇科夫從 1913 年起開始關注中國, 雖親身參與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蘇聯國內戰爭, 在 20 世紀 30-40 年代大清洗時期又兩度身陷囹圄, 但對漢學研究卻孜孜以求, 俄羅斯漢學界對其學術成就和高尚的人格懷有深深的敬意。

1962 年是斯氏的古稀華誕, 當時蘇聯漢學最重要的研究機構——蘇聯科學院亞洲各民族研究所召開紀念會

議, 最重要的學術期刊《亞非各民族》(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和《歷史問題》(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上都專門發表了紀念文章。1992 年是斯氏百年壽辰, 俄羅斯漢學界緬懷駕鶴西去的前輩, 在 1991 年就提前一年在最重要的漢學期刊之一《遠東問題》(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上連載斯氏在其生活中最艱難時期所留下的筆記。1992 年 2 月 14 日, 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召開隆重的紀念大會。1993 年, 專門紀念斯氏百年壽辰的《時代的紐帶沒有繼裂……》(И не распалась связь времен...) <sup>2</sup> 由當前俄羅斯漢學領袖齊赫文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 院士主編出版, 米亞斯尼科夫院士撰文研究斯氏日記中所反映的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生經歷, 感歎其在逆境中對漢學研究的不懈追求以及其在經歷了 14 年的勞改生活, 以及他重獲光明正大的學術研究權利後, 對同事及後學的支持和幫助。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研究員沙塔洛夫 (О. В. Шаталов) 整理了現藏於該所檔案館的「斯卡奇科夫全宗」(共計 150 件), 包括以 1951-1964 年間和 1936-1948 年間的兩部分資料。斯氏留下的檔案以前一部分為主, 反映了他在俄國漢學史、東方學史以及 17 世紀以來的俄中關係史方面的研究。第二部分檔案較少, 反映了斯氏在中國書目文獻研究領域的研究。對於斯卡奇科夫的手稿《俄羅斯漢學家的手稿遺產及其在俄羅斯漢學史上的意義》(Рукописное наследие русских китаеведов и его

\* 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副教授。

1 П. Е. Скачко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1977, стр. 3.

2 *И не распалась связь времен...*, М., 1993.

значение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使我們瞭解到斯氏俄羅斯漢學手稿研究所付出的辛苦努力。2003年，聖彼得堡出版了《人與命運——蘇聯時期政治恐怖的犧牲品——東方學家生平詞典》（*Люди и судьбы,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востоковедов — жерт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террора в советский период*），該書的「斯卡奇科夫」一條中，<sup>3</sup>扼要地再現了斯氏的一生和學術成就。

同俄羅斯漢學學者和各國研究、關注俄羅斯漢學的學者一樣，中國學者同樣把斯氏的《中國書目》、《俄羅斯漢學史》作為案頭必備的工具書。《俄羅斯漢學史》在蘇聯問世的第三年，王瑾在《中國史研究動態》1980年第3期上便發表長篇提要介紹該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學研究中心開始組織翻譯，世事輾轉，在譯者孫越生先生去世後已完成大部的譯稿，現不知在何處。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的「譯著叢刊」非常重視此書，現該書的翻譯已基本完成，預計2009年中譯本可問世。

儘管如此，但對《俄羅斯漢學史》的作者斯卡奇科夫其人其學的成果研究卻鮮有所見。本文通過在這方面的研究，再現俄羅斯東方學、漢學的學術傳統與承接，挖掘俄羅斯東方學、漢學的根本特點——通過滿足國家的實際需要發展自身，展現俄羅斯漢學在當今起伏的社會局勢中曲折發展的過程。

## 二、跌宕人生：俄羅斯漢學史的縮影

斯卡奇科夫於1892年2月14日生於彼得堡附近卡盧加省的一個農民之家。1911年畢業於彼得堡商業學

校後在國家儲蓄局工作。1913年，斯卡奇科夫開始在彼得堡實用東方學學院夜校部學習漢語，曾長期在中國生活的斯梅卡洛夫（Г. Ф. Смыкалов）<sup>4</sup>帶領學生通過閱讀報刊文摘學習漢語語法，知識淵博的伊萬諾夫（А. И. Иванов）<sup>5</sup>用他在北京出版的教材《漢語初級讀本》教漢語課，並專門為學生編寫、石印了該書的生詞表。漢字、速寫、中國地理課等也是實用東方學學院為漢語專業學生所設置的課程。當斯卡奇科夫正徜徉於漢語世界之中時，1914年，戰爭爆發了，斯卡奇科夫應徵入伍被派往前線。1917年被派往韋鮑爾格要塞，俄國二月革命後在沙皇軍隊任連長，從1918年底開始加入蘇聯紅軍，在西伯利亞參加了打擊高爾察克的戰役。在這4年裏，漢語暫時遠離了斯卡奇科夫。1920年，斯卡奇科夫在西伯利亞總司令部任要職，在駐地鄂木斯克，斯卡奇科夫有機會與相鄰而居的中國人學漢語。

1922年，斯卡奇科夫轉業被派到彼得堡東方應用語言學院。在第一次上課，阿列克謝耶夫提到了梅熱夫（Вл. И. Межов）的《亞洲書目》（*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Азии*）、《西伯利亞書目》（*Сибирская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等書，並鄭重地提出了他對學生的一貫要求，必須通過俄語語法課，然後才能開始學漢語。從瓦西里耶夫（В. П. Васильев）的《漢語文選》（*Китайская хрестоматия*）到阿列克謝耶夫（В. М. Алексеев）的《司空圖的詩品》（*Китайская поэма о поэте. Стансы Сыкун Ту*）、到《聊齋》的翻譯，阿列克謝耶夫為斯卡奇科夫打開的漢語世界「是全新的，從此漢字課文對我來說具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sup>6</sup>第二年開始就按《詞源》邊讀邊譯，第三年則是翻譯各類典籍。

3 *Люди и судьбы: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востоковедов — жерт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террора в советский период*.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3, стр. 352.

4 斯梅卡洛夫 1902 年畢業於彼得堡大學東方系，1903 年至 1907 年間在中東鐵路北京管理處的俄漢學校擔任教師，同時擔任《遠東報》翻譯。1908 年至 1910 年間在尼古拉皇家學校擔任教師。1910 年起在俄國財政部辦公廳工作，1911 年起在彼得堡東方應用語言學院擔任教師，教授語法和報章課。

5 伊萬諾夫 1901 年在彼得堡大學東方系畢業後留校繼續深造，擔任東方學學會東方語言培訓班和彼得堡東方應用語言學院的教師，曾任東方應用語言學院副院長、院長，1913 年獲得中國語言文學博士學位，並成為這一專業的編外教授，是《現代漢語語法》（*Граммати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的作者之一。

6 *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не распалась связь времен...*, М., 1993, стр. 15.

1925年從東方應用語言學院畢業後，斯卡奇科夫被秘密派往中國，<sup>7</sup>在張家口蘇軍顧問小組工作。當時中國的政治局勢複雜，繼而更是軍閥爭戰。支持正規軍馮玉祥的蘇聯軍事小組工作複雜而危險。在這期間斯氏有過兩次長途旅行，第一次是帶隊將張家口蘇軍顧問小組的家屬疏散回國，路線是張家口——包頭——烏蘭巴托——烏蘭烏德——哈爾濱——大連——天津——北京。第二次旅行的任務是移送外交信函，路線為北京——天津——上海——廣州——上海——漢口——上海——天津——北京。兩年的中國生活讓斯卡奇科夫切身瞭解了中國文化的各個側面，完善了漢語語言知識和技能。從中國回國後，他先是在軍事技術學校任教，後來調到軍事政治學院任教。1929年，調任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圖書館館長，擔任一級研究員。

1928年，蘇聯出版了《東方書目》（*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Востока*），斯氏認為該書內容不夠全面，編排上也缺乏科學性，為此，斯奇科夫在《中國問題資料》（*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вопросу*）雜誌上發表了書評。由此，在斯氏的內心也產生了編寫一部真正科學的中國書目的想法。在東方所圖書館工作的這一時期，斯卡奇科夫一直在廣泛地收集關於中國的文獻資訊，在列寧格勒、莫斯科、喀山等地的圖書館奔波查索。他花兩年多的時間，系統地總結和批判性地研究了兩個世紀以來俄羅斯漢學領域的全部學術遺產，整理1730年至1930年間俄文發表的關於中國的論著、譯作編目，並於1932年出版了《中國書目》（*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Китая*）一書。

斯卡奇科夫的學術興趣非常廣泛，他對中國的地理和地圖問題早就非常關注，1933年，他仔細整理自己從中國帶回的資料，並出版了專著《內蒙古》（*Внутренняя Монголия*）。1937年，經過大量補訂後，該書由蘇聯科學院出版社再版。蘇聯學術界認為，該書是蘇聯該領域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是進一步研究該領域的基礎。<sup>8</sup>也是在

這一時期，斯卡奇科夫編輯的一份比例尺為1:6000000的中國中部和東部的地圖，由全蘇地圖集團出版，同時斯氏還為《蘇聯世界地圖全集》（*Большой Советский Атлас Мира*）第3卷編寫了18份經濟地理地圖。

斯卡奇科夫對於漢語語言學和詞彙學非常關注，在30年代初他與一些研究漢語語言的漢學家研究漢字的拉丁化問題，在《馬克思主義問題》雜誌上發表文章回應阿列克謝耶夫的相關論著。1935年，斯卡奇科夫以其發表的論著被授予副博士學位。

1937年至1938年間的肅反大清洗運動，給蘇聯社會造成了嚴重創傷，各個領域的社會精華均受到摧殘，斯卡奇科夫在這場可怕的運動中飽受磨難。1937年2月10日，<sup>9</sup>斯卡奇科夫被非法拘捕。9個月後被判處10年勞改，並剝奪政治權利。6個月後，他的妻子和孩子被捕，後來被發放至塔吉克。直到1939年一家人才得以互通音訊。在遠東科累姆的勞改集中營，斯卡奇科夫經歷著恐怖的折磨，他經常患病、住院，身體幾近殘疾，服刑至1946年因健康原因提前一年獲釋。

由於不允許在列寧格勒居住，斯卡奇科夫來到妻子和孩子所在的塔吉克，先是在地區土地局當會計，後來在一家幼稚園當會計。在塔吉克，他繼續為《中國書目》收集資料，為該書的增訂本做準備，和已是科學院院士的阿列克謝耶夫保持積極的通信，在1948年8月4日的通信中，阿列克謝耶夫寫道：「我認為這部著作很重要，除了您，任何人都不能完成……我們願意接受您為《中國書目》所做的所有補訂，並支付報酬」。<sup>10</sup>

1949年1月25日，斯卡奇科夫再度被捕，被判處無期徒刑，被押送到西伯利亞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的塔謝耶夫區達尼爾卡村。在這裏他先是在地區集體農莊學校教會計課，後來在塔謝耶夫森林工業聯合體供應處當會計。處於流放般生活狀態的斯氏繼續補訂《中國書目》，同莫斯科的列寧圖書館通信。圖書館正式請求

7 Записки по памяти (1938-1963),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1, №3, стр. 193.

8 В. С. Мясников, "Петр Емельянович Скачков,"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962, №1, стр. 219.

9 關於斯氏被捕的時間，在《人與命運》一書中是1937年2月12日，但斯氏女兒撰寫的簡要生平（見本文註釋7）中記載的則是1937年2月10日。本文認為斯氏女兒作為親歷者的記憶應該是準確無誤的。

10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1, №3, стр. 193.

他把補訂好的 1931 年至 1935 年間的書目寄給圖書館。1954 年，斯卡奇科夫獲釋，但不能在首都和大城市居住。如果選擇列寧格勒，就必須在列寧格勒 100 公里的地方。斯卡奇科夫來到列寧格勒郊外 100 多公里的索斯諾沃村。1955 年 12 月 7 日，斯卡奇科夫獲准來到莫斯科，在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擔任助理研究員。這時的他還沒有得到平反，但在這裏他可以全力地投入《中國書目》的補訂工作。1956 年 3 月 21 日，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撤銷了 1937 年 11 月 7 日對斯卡奇科夫的判決，為其徹底平反。從 1956 年起，斯卡奇科夫成為東方學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他的妻子和孩子也得到平反，斯卡奇科夫一家重新開始生活在列寧格勒。

1956 年 12 月，蘇聯科學院成立了中國學研究所，斯卡奇科夫作為該所的高級研究員。他每星期兩次從列寧格勒來到莫斯科，每次到來都是所裏的大事。他總是為同事們帶來一些特別有用的文獻資訊，年輕人圍在他身邊拋出各種問題，年長一些的學者對他充滿敬意。年長的同事大都與他同為阿列克謝耶夫弟子，如奧沙寧（即「鄂山蔭」，И. М. Ошанин，《漢俄大辭典》的主編）、杜曼（Л. И. Думан）、艾德林（Л. З. Эйдин）以及 1959 年起任中國學研究所所長的齊赫文（Б. С. Тихвинский）。斯卡奇科夫在公共圖書館、科學院圖書館爭分奪秒地工作著，查閱大量的檔案資料和手稿文獻。1958 年，斯卡奇科夫主持並親自參加撰寫的兩部以檔案和手稿為基礎的重要著作——《1689 年至 1916 年的俄中關係·官方檔》（*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689-1916.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和《在太平天國起義日子裏的北京——一個親歷者的筆記》（*Пекин в дни тайпинского восстания. Из заметок очевидца*）問世。

編著書目仍是他堅持不懈鑽研的目標。1957 年莫斯科出版了他和格拉戈列娃（И. К. Глаголева）合編的《中國文學書目》，<sup>11</sup> 收入了俄譯中國文學作品和俄文發表的關於中國文學的研究論著。斯氏在任何情況下都鋌而不捨地耕耘的《中國書目》，也在 1960 年收穫了新的果實——《中國書目》的第二版終於面世了。第二

版《中國書目》補收了 1930 年至 1957 年在蘇聯以俄文出版的關於中國的論著（報刊文章、專著、譯作、詞典等），新增條目達 9,300 多條，並重新編排了全書的結構。第二版《中國書目》得到了學者的普遍稱讚，很快就銷售一空。斯卡奇科夫接著又把編寫《俄蘇漢學家書目詞典》（*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их и советских китаеведов*）作為下一步工作的目標。20 世紀 60 年代完成了《俄羅斯漢學史》的初稿。1963 年初，蘇聯科學院亞洲各民族研究所準備討論斯卡奇科夫兩部巨著的手稿——《俄羅斯漢學史》和《俄羅斯漢學家書目詞典》。

1964 年，斯卡奇科夫因病住進了醫院，11 月 7 日，在醫院永遠地離開了他曾不倦地追求的事業——俄羅斯漢學史研究。

### 三、俄羅斯東方學歷史之淵源

在俄羅斯民族發展的歷史上，東斯拉夫人在東歐平原上活動時就同東方民族有著直接的接觸。經過十幾個世紀的歷史變遷，從 19 世紀初起，俄國開始從學術上展開對東方的系統研究，俄羅斯的東方學得到發展。隨著俄國在遠東活動的增多，漢學成為東方學的重要內容之一。到了西方世界從政治、經濟上密切關注東方的 19 世紀、20 世紀之交，俄羅斯東方學成就使人們能夠細緻地瞭解東方甚至親身在東方遊歷，斯卡奇科夫正是在這樣的政治和學術背景之下，一步步地進入了俄羅斯漢學這個浩瀚的領域。

俄羅斯民族同東方民族交往的歷史悠久。早在羅斯人在東歐平原上遷徙生活的時代，就有東方的遊牧民族阻擋了羅斯人向東遷徙的腳步。在俄羅斯國家成立以後，由北向南商路的延伸帶動著俄羅斯民族歷史的發展。西元 9 世紀，在繁忙的「瓦希商路」上，羅斯人順第聶伯河而下到黑海沿岸區域和拜占庭、沿伏爾加河南下，經當時佔據著伏爾加河下游、第聶伯河流域和北高加索地區的哈紮爾王國，抵裏海東南岸至阿拉伯國家，東方人是羅斯人貿易的主要對象。西元 10 世紀中期，

11 Скачков П. Е., Глаголева И. К., *Китайская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русских переводов и кр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М., 1957

羅斯大公伊戈爾和斯維亞托斯拉夫多次遠征哈紮爾。972年，羅斯大公斯維雅托斯拉夫死於佔據伏爾加河下游到多瑙河口的東方游牧民族佩切涅格人之手。蒙古入侵之前，基輔羅斯東部邊界上與東方游牧民族波洛夫齊人時有摩擦，亦敵亦友。蒙古入侵時期，歐亞貫通，「金帳汗與埃及和拜占庭保持著密切的外交關係，同時在克裏米亞的熱那亞殖民就當著與歐洲通商的中間人。在克裏米亞和薩來地方的索克漢城鎮吸引著許多國家的商人」。<sup>12</sup> 15-16世紀，俄羅斯擺脫了蒙古人的統治，以莫斯科公國為中心，其勢向伏爾加河下游及中亞地區的擴張，俄羅斯商人開始往來於中亞。為了取得黑海的出海口，俄國同奧斯曼土耳其長期糾葛，時戰時和。另一方面，與俄國通向中亞、南亞道路相關的波斯一度也是俄國的征戰目標。因此近東、中東一直是俄國密切關注的對象，克裏米亞、土耳其、高加索、波斯，與俄國之間或商賈、使節相往，或戰火綿延。

在經濟、政治、文化上與東方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的俄羅斯，在彼得一世大學實行改革的時期，配合國家利益的需要，推出了一系列與東方學發展有著密切關係的重大舉措，如組織東方語言教學，有目的地收集關於東方的原始資料、文獻和地圖，創建相應的陳列館，撰寫和翻譯一些關於東方內容的書籍；在東方各地——在波斯、布哈拉、高加索、西伯利亞、堪察加、中國的考察，對俄國東方學發展的推動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彼得一世的東方問題顧問——康捷米爾，<sup>13</sup> 精通阿拉伯語、

波斯語、土耳其語及其文獻，是第一位俄羅斯東方學家。1725年成立的彼得堡科學院，德國人拜耶爾<sup>14</sup>於1728年受聘於東方古代史院士職位，此後在整個18世紀有多位院士雖不是東方學院士，但其研究活動卻與東方甚至中國密切相關，如歷史學院士米勒、費舍爾等。18世紀俄國向歐洲開放的大環境使俄國的知識份子迅速成長起來。俄羅斯民族及俄羅斯歷史同東方的密切關係，使得俄國的知識份子對東方的文化十分關注，如第一部《俄國史》的作者——卡拉姆津，也是印度戲劇的翻譯者，拉吉舍夫、諾維科夫、格裏鮑耶陀夫等無一不關注東方。大學相繼建立，於1804年成立的喀山大學，是最早建立的大學之一，在1807年就成立了東方系，包括阿拉伯波斯語專業、土耳其韃靼語專業、蒙古語專業。19世紀中期，俄國科學院的院長維謝洛夫斯基即是東方學院士，東方學成為俄國學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樣的東方學背景之下，培養出一批具有世界聲譽的東方學家如克拉奇科夫斯基、巴托爾德、弗拉基米爾佐夫、阿列克謝耶夫等。<sup>15</sup>

俄國同中國的直接接觸可以追溯到蒙古帝國時期，「在此期間，在莫斯科、大不裏士和諾夫哥羅德都有中國僑商的居住地」。<sup>16</sup> 15世紀在成為國際性貿易中心的中亞，中俄商人在此經商。經過中國商品充斥市場的16世紀到17世紀，中國已經完全進入了俄商和俄國政府的視野，17世紀至18世紀俄國屢屢向中國派出使團，使團出使的「通商」目的卻難以實現，這使得俄國加緊

12 [俄] 佛那基，《俄國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32），頁50。

13 康捷米爾（Кантемир Дм. Конст, 1673-1723），阿拉伯語、波斯語和土耳其語及土耳其文獻專家、摩爾達維亞學者、作家、政治活動家，1710年起為摩爾達維亞大公。參加了普魯士遠征。1711年起在俄國擔任彼得一世的東方問題顧問，參加了彼得一世1722-1723年間的遠征波斯。留下了大量關於摩爾達維亞、奧斯曼帝國歷史和地理的著作。

14 拜耶爾（Байер Готлиб Зигфрид, 1694-1738），普魯士歷史學家、語文學家，1725年起擔任彼得堡科學院院士，著有大量關於東方學和古羅斯歷史的著作，1731年在彼得堡出版了歐洲第一部漢語語法書《中國博覽》（*Museum Sinicum*）。詳見柳若梅的〈18世紀俄羅斯漢學先驅拜耶爾〉，《中西文化研究》（澳門），2003年第1期。

15 克拉奇科夫斯基（Крачковский Игн. Юлианович, 1883-1951），東方學家，俄羅斯阿拉伯學的奠基人之一，1921年當選為蘇聯科學院院士，1951年獲蘇聯國家獎；巴托爾德（Бартольд Вас. Вл., 1869-1930），東方學家，1913年當選為彼得堡科學院通訊院士，著有大量關於中亞、伊朗、阿拉伯歷史研究的著作；弗拉基米爾佐夫（Владимирцев Бор. Як., 1884-1931），蒙古學家，1929年當選為蘇聯科學院院士，著有大量關於蒙古游牧封建史、蒙古語言、文學和民族學的著作；阿列克謝耶夫（Алексеев Вас. Мих., 1881-1951），漢學家，1929年當選為蘇聯科學院院士，著有大量關於中國語言、文學、民俗學研究的論著。

16 [美] 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頁419。

了對中國的研究。18世紀中葉之前，俄羅斯漢學開始發軔。在18世紀葉卡捷琳娜二世統治時繁榮發展的書報業中，中國文化典籍通過生活在中國的耶穌會士的譯本、俄羅斯東正教駐北京使團成員的譯本，被大量地傳到俄國。19世紀，以比丘林、加緬斯基、利波夫措夫為代表的俄羅斯東正教使團成員進一步把當時中國方方面面的狀況以及中國邊疆民族的歷史傳往俄國和歐洲，使俄羅斯漢學步入了世界漢學之林。1837年，在喀山大學設立了漢學教授席位，第一任教授是曾為俄羅斯東正教駐北京使團醫生的西韋洛夫（Даниил Сивиллов）。1866年科學院再次設立漢學院士席位，主持聖彼德堡大學東方系的瓦西裏耶夫（В. П. Васильев）獲此殊榮。隨著歐洲學術的發展乃至整個世界漢學的發展，也隨著俄國在遠東活動的日益增多，特別是俄國在中國西部所進行的一系列考察，俄羅斯漢學的成果日益豐厚。到了19世紀末，一度以研究中國的各方面著稱於世的漢學逐漸進入各個學科領域，成為俄羅斯學術各領域的重要內容。1917年10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使世界政治格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蘇聯東方學在列寧的東方學思想——幫助東方覺醒、支持東方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指導之下，呈現出一派新氣象，蘇聯漢學再次顯現出其滿足政治需求的實際功用。蘇聯既要協調其境內各東方民族的問題，同時也要同世界上各東方國家建立良好的關係。東方學研究一時蔚為大觀，漢學也受到了重視，發展蓬勃。一方面傳統漢學研究進一步深化，在考古學、歷史學、語言學、文學等各領域，與相關的中國內容被納入視野；另一方面，東方各民族當時的狀況，其發展道路和發展前途也成為東方學研究的重要內容，如在中國問題研究方面，關於中國民主革命等內容成為蘇聯漢學的關注目標。

厚重的俄羅斯東方學和漢學的發展也得益於俄羅斯自彼得一世開始的東方收藏。1714年，以彼得一世的私人收藏為基礎，在彼得堡成立了一所珍寶館。1718

年，遵照彼得一世要求進行東方考察的命令，西歐學者梅塞爾施密特（Д. Г. Мессершмидт, 1685-1780）應邀主持了前往西伯利亞的考察。這次在西伯利亞、達斡爾和蒙古的考察持續了7年，珍寶館的第一批中文書就來自於梅塞爾施密特。此後作為俄國駐華商務代表的勞倫斯·朗格（Лоренц Лонг）6次前往中國，據載1730年帶回大量中文、滿文書籍。1738年，珍寶館專門安排兩位院士整理珍寶館的中文書籍。1741年，羅索欣（И. К. Россохин）和列昂季耶夫（А. Леонтьев）受命為館藏中國圖書編目，<sup>17</sup>但這份書目沒有保存下來，或許毀於1747年珍寶館遭遇的那場大火。1766年，列昂季耶夫再次編號整理了科學院的中文、滿文、蒙文和日文書籍。1779年，巴克邁斯特<sup>18</sup>在《聖彼德堡皇家科學院自然史和珍品收藏》（*Опыт о библиотеке и Кабинете редкостей и истории натуральной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一書中介紹了珍寶館的藏品，其中包括東方手稿和2,800本中文書。1798年，科學院院士布塞在列昂季耶夫書目的基礎上進行了分類，把科學院的中文書分成哲學、國家、軍隊類，歷史地理類、天文地理類、小說類、啓蒙小學類等，計238種。<sup>19</sup>此時，彼得堡科學院圖書館在規模和數量上已成為歐洲最大的圖書館之一。1818年，受彼得堡科學院主席烏瓦羅夫（С. С. Уваров）委託，加緬斯基（П. Каменский）和利波夫措夫（С. Липовцов）整理科學院所藏中文書和日文書籍，出版了《科學院圖書館所藏中文和日文書籍目錄》（*каталог по китайским и японским книгам в библиотеке и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這份書目共57頁，每本書有題注，整個書目按內容分類，其中中文書377種，計2,957本。1841年，科學院的德籍學者布羅塞（М. И. Броссе）再次整理了科學院圖書館的中文書，在《國民教育部雜誌》上發表了22頁篇幅的〈科學院亞洲博物館的中文館藏〉（*О китайской библиотеке Азиатского музе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一文。1843年，彼

17 П. Е. Скачко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1974, стр. 133.

18 巴克邁斯特（И. Г. Бакмейстер, ? - 1788），彼得堡科學院珍品博物館負責人，阿拉伯語專家。

19 "Ueber die bei der hiesigen Bibliothek angesammelten Bücher in Sinesischer, Vandschuidher, Vongolischer und Japanischer Sprache", *Busses Journal für Russland*, Th. II, 1794, стр. 128-134, 216-221, 277-280.

得堡出版了《外交部亞洲司圖書館藏漢、滿、蒙、藏、梵語書籍、手稿和地圖目錄》，全書共 102 頁，其中中文書籍目錄佔 65 頁，滿文的佔 9 頁。隨著東方學在大學的設立，大學圖書館的東方收藏也不可忽視。1834 年，蒙古學家科瓦列夫斯基（О. М. Ковалевский）整理了喀山大學藏東方書目，發表了《喀山大學圖書館藏梵、蒙、藏、滿、漢手書籍和手稿目錄》（*каталог по санскритским, монгольским, тибетским, мнѣжур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кингам и рукописям...*）。1857 年，瓦西里耶夫在《俄羅斯通報》（*Русский вестник*）上發表了〈彼得堡大學的東方書籍〉（*Записка о восточных кингах в 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一文。1890 年，伊萬諾夫斯基（А. О. Ивановский）在《東方觀察》（*Восточ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上發表了〈皇家地理學會東西伯利亞分會圖書館藏漢、滿、蒙文書目〉（*Каталог книг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маньчжурском и монгольском языках...*）。1910 年在遠東，成立不久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東方學院也發表了其館藏書目《東方學院圖書館中文書目》（*Шифровый каталог китайских книг библиотеки восточ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1912 年，從中國返俄的阿列克謝耶夫來到亞洲博物館任館員，他首先著手中文圖書的研究和編目，1918 年已是高級館員的阿列克謝耶夫繼續進行亞洲博物館圖書的採編工作。為館藏資源編目成為俄羅斯東方學學者、漢學家歷來的傳統。

#### 四、20 世紀俄羅斯漢學

隨著漢學研究的不斷深入，到 20 世紀特別是蘇聯革命勝利後，總結蘇聯國內外研究中國的成果，成為蘇聯漢學關注的重要內容，在書目的編寫方面也體現了這一點。在 20 世紀的 20 年代至 30 年代，在蘇聯的書刊中關於東方研究的書目繁多，其中影響較大的有以下幾部。其一為 1894 年出版的兩卷本的《亞洲書目》，編者

為曾編寫過大型書目《俄羅斯史書目》的俄羅斯第一位專業的文獻學家梅熱夫，該書目第 1 卷共 230 頁，收入了 1888 年以前俄國關於阿拉伯、阿富汗、中國、蒙古、土耳其、波斯、日本等國家的論著，其中中國佔 54 頁的篇幅。第 2 卷是關於俄國境內起源於蒙古、韃靼的各民族的論著。梅熱夫所編寫的三卷本《西伯利亞書目》在其辭世後於 1903 年問世。該書目第 1 卷包括了西伯利亞史的基本史料——書目、歷史檔和紀錄、書信和回憶錄；第 2 卷是西伯利亞的地理學、民族學、統計學研究內容；第 3 卷包括法律、政治、教育、社會學、自然科學、醫學等內容。這兩部書目集俄國長期以來的亞洲研究、西伯利亞研究之大成，在東方學領域影響很大。

##### （一）中國書目的出版

蘇聯時期，面對陡然激增的東方學研究成果，主持國立俄羅斯博物館的世界史專家葉戈羅夫（Д. Н. Егоров）<sup>20</sup> 開始著手進行系統的文獻編目工作。1928 年出版了《東方書目》（*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Востока*）的第 1 卷，此後該書目相繼出版 10 卷，收入了 1917 年至 1936 年間蘇聯出版的關於東方的所有論著。

1928 年《東方書目》發表後，斯卡奇科夫對之非常關注，於 1928 年和 1929 年分別在雜誌《中國問題資料》（*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у вопросу*）和《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Историк-марксист*）（該刊為後來蘇聯、俄羅斯歷史學最權威的期刊《歷史學問題》的前身）上發表評論文章。在亞洲博物館，身為東方所圖書館館長的斯卡奇科夫開始關注俄羅斯的中國書目和蘇聯漢學史，<sup>21</sup> 開始了他關於《中國書目》的資料採集。通過對國立公共圖書館、科學院東方所亞洲博物館圖書館、列寧格勒東方學院圖書館、俄羅斯地理學會圖書館、莫斯科的共產主義學院中國問題研究所圖書館、符拉迪沃斯托克國立遠東大學圖書館的中國及相關問題書刊館藏的調查與採集，斯卡奇科夫對以往書目中關於中

20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維奇·葉戈羅夫（Дмит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Егоров, 1878-1931），著名歷史學家，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研究方向為世界通史，1924-1925 年主持俄羅斯國立博物館，1929 年起任副館長，大清洗期間被捕，服刑滿一年後被遣發至塔什干，1931 年心臟病突發去世。

21 Институт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зиатский музей*, М., 1972, стр. 89.

國的內容進行重新整理和核對，並帶領同事阿布拉姆松（М. Абрамсон）、卡拉·莫爾紫（Кара-Мурза）系統整理所得資料，妻子斯卡奇科娃在該書目的整理工作中投入了大量精力。1930年，剛成立的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設立了以阿列克謝耶夫主持的中國—西夏研究室（該室1932年起更名為「漢滿室」，1934年起更名為「中國室」），後來在該室成立的「漢學家學術實驗室」的主要目的就是研究書目資源、編制重要的中國文獻索引和重要的漢學論著索引。

1932年，在斯卡奇科夫的主持之下，俄羅斯漢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書目著作——《中國書目》終於問世。該書共10,248條，全面收入了1730年至1930年間以俄文在俄國和蘇聯的報刊發表的所有關於中國的文章以及關於中國的著作、翻譯作品，並為重要著作做了詳細的提要注釋。其充實的內容和極高的學術價值受到蘇聯國內外的廣泛讚譽，成為圖書館和學者個人的必備資料，很快便一書難求。1948年該書在美國影印出版。後於1988年被美國密西根大學安娜堡校區再度影印。漢學隨著學術內部和外部環境的變化而發展，新中國成立以後，特殊的中蘇國家關係以及蘇聯的東方政策使得蘇聯的中國學研究特別活躍，關於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國的民主革命、漢語、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成果大量湧現。斯氏對中國學研究的這一新狀況十分關注。實際上，斯卡奇科夫在1932年就開始《中國書目》第二版補訂工作，此後的三十餘年間，儘管世事滄桑，但斯氏鍥而不捨，將1930年至1957年間俄國、蘇聯時期以俄文出版的漢學論著、譯著收入，於1960年完成了《中國書目》的第2版，條目達19,260條，將俄羅斯漢學

史上的書目編纂推入了新的時代。書目整理成為俄羅斯東方學重要的學術傳統之一，在斯卡奇科夫之後，俄羅斯漢學的書目仍在蘇聯科學院按年份整理著。1999年，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出版了《俄國東方學：過去和現在》<sup>22</sup>一書，收入了1726年至1997年間俄羅斯以各種語言出版的全部東方學研究著作，共計4,462部。

## （二）俄羅斯漢學史

俄羅斯漢學傳統不僅體現在「編目」上，「修史」也是值得關注的一個重要部分。在18世紀末，被譽為「俄羅斯漢學家的搖籃」的俄羅斯東正教駐北京使團第8屆團長索夫羅尼·格裏鮑夫斯基在北京時就整理過俄國人在中國以及俄羅斯東正教駐北京使團的歷史，該資料後來發表在《俄國駐北京傳道團史料》（*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一書中。<sup>23</sup> 19世紀末，身為俄羅斯東正教駐北京使團第16、17屆司祭的阿多拉茨基（П. С. Адоратский）於1887年和1888年分兩次發表了東正教駐華使團在1685-1745年間和1745-1808年間兩個時期的歷史，出版了《東正教使團在華二百年》<sup>24</sup>一書。並在1885年至1888年間，先後發表了其整理的俄羅斯東正教在華活動歷史，<sup>25</sup>展現了俄羅斯漢學早期發展的重要內容。19世紀末，科學院院士巴托爾德在彼得堡大學開設了「歐洲和俄羅斯研究東方的歷史」的課程，俄羅斯研究東方的歷史被放在歐洲東方學的背景之下，從學術的角度系統地展現出來，對斯卡奇科夫的漢學史研究有很大的影響。該講義後來公開出版，<sup>26</sup>成為俄羅斯東方學史的重要資料。20世紀30年代起，阿列克謝耶夫主持的亞洲博物館中國室，一

22 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востоковедная наука: прошлое и настоящее, М., 1999.

23 Н. И. Веселов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 С.-Пб, 1905. 中譯本見[俄]尼·伊·維謝洛夫斯基編，《俄國駐北京傳道團史料》（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

24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Китае за 200 лет 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中譯本見閻國棟、肖玉秋譯，《東正教在華兩百年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

25 П. С. Адоратский, *Положение миссионерства в Китае. Казань, 1885.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Китае за 200 лет 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Казань, 1887.*

26 В. В. Бартольд, *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Востока в России и Европе*, Л., 1925.

直非常注重整理俄羅斯漢學研究成就，留下了《蘇聯漢學 30 年》的手稿<sup>27</sup>以及《40 年的列寧格勒漢學》<sup>28</sup>等成果。

隨著書目的編寫以及對中俄關係史的整理，俄羅斯漢學史上的人物、事件越來越吸引斯卡奇科夫。在 1933 年，斯氏就發表了關於比丘林生平的文獻資料，<sup>29</sup>此後不斷發表在檔案中發現的關於比丘林的學術遺產和書信的新資料。關於俄羅斯漢學巨匠卡法羅夫（П. Кафаров）、瓦西里耶夫的資料也不斷地被斯卡奇科夫整理發表。俄羅斯漢學史上一些鮮為人知的畫面，如俄羅斯的第一位漢語和滿語教師、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的醫生等內容也由斯氏一一展示給學界。隨著對檔案資料和 18 世紀至 19 世紀文獻的不斷研究，早年在東方實用語言學院聆聽巴托爾德的《歐洲和俄羅斯研究東方的歷史》時就產生過撰寫一部俄羅斯漢學史的想法越來越清晰地凸現出來。爲了最大程度地揭示俄羅斯關於東方國家研究的成果，斯卡奇科夫以高度的專注反復閱讀藏在莫斯科、列寧格勒等地的成千上萬份手稿、檔案、大事記等珍貴資料，終於在經歷了數十年爬梳後的 1962 年，完成了 1917 年以前俄羅斯漢學的發展歷程的梳理，成《俄羅斯漢學史》的初稿。在該書撰寫的過程中，斯氏不僅對俄羅斯漢學史進行梳理，而且公布了一些關於中國歷史和俄羅斯漢學史的新資料，如 1848 年受命前往中國主持俄羅斯東正教駐北京使團天文站的 K. A. 斯卡奇科夫的手稿。<sup>30</sup>斯卡奇科夫帶領剛剛工作不久的米亞斯尼科夫（當今俄羅斯科學院漢學家協會主席、科學院院士），細心識別 K. A. 斯卡奇科夫在太平天國起義時期記下的日

記，整理出版了《太平天國起義日子裏的北京》（*Пекин в дни Тайпинского восстания*）一書，在再現 K. A. 斯卡奇科夫學者漢學家形象的同時，也豐富了中國太平天國歷史研究的資料。與此同時，斯氏挖掘檔案資料的價值的做法培養帶動了年輕學者，促進了俄羅斯漢學研究以檔案資料爲基礎的學術風格的形成。遺憾的是，斯氏在生前卻沒能看到《俄羅斯漢學史》一書問世。在斯氏去世 13 年之後的 1977 年，斯氏的弟子米亞斯尼科夫傾數年之功，整理先師的學術遺產，出版了《俄羅斯漢學史》<sup>31</sup>一書。該書全面再現了自有史以來中俄交往到 1917 年以前的俄羅斯漢學研究，問世後在國際學術界影響很大。1979 年德國、美國、日本等地的學術期刊上都發表了相關的書評，<sup>32</sup>至今該書仍是國際漢學研究領域必須參考的經典力作。斯氏的《俄羅斯漢學史》爲中國學者的俄羅斯漢學史研究提供了方便。正是在研究斯氏著作的基礎上，閻國棟於 2006 年和 2007 年分別出版了《俄國漢學史》和《俄羅斯漢學三百年》兩部著作。

斯卡奇科夫的俄羅斯漢學史研究同樣是俄羅斯東方學研究歷史的一部分，「應當被認爲是巴托爾德院士《歐洲和俄羅斯研究東方的歷史》的有機延續」。<sup>33</sup>在斯氏的《俄羅斯漢學史》之後，東方學史、漢學史研究仍在繼續。蘇聯時期東方學發展迅速，其研究工作的組織、人才培養數量不斷加強，研究視野的開闊性、現實性及研究深度也不斷提高，爲了全面總結蘇聯東方學的發展過程，1970 年，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科學院東方學機構的發展爲中心研究蘇聯東方學歷史，出版了《蘇聯東方學歷史（1917-1967）》<sup>34</sup>對蘇聯漢學迅速發展的狀

27 В. М. Олексеев, *30 лет советской синологии*, 該手稿現藏於俄羅斯科學院古代文獻研究所東方學家檔案館。

28 З. И. Горбачева,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Н. А. Петров,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 в Ленинграде за сорок лет*, УЗИВАН, т. XXV, М. 1960, стр. 82-101.

29 П. Е. Скачков, Иакинф Бичурин (1773-1853),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к биографии," *Библиотек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1933. Вып. 2-4, стр. 79-90.

30 К. А. 斯卡奇科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Адрианович Скачков 1821-1883），第 13 屆俄羅斯東正教駐北京使團隨團學生，在北京期間主持使團天文站工作，留下了大量關於中國天文、農業等方面的研究成果。1866 年起在彼得堡大學東方系任教，1867 年調任俄國駐天津領事。

31 П. Е. Скачко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1977.

32 1979 年，美國 Chou Nailene 在《東方文化》（*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 38, №4, pp. 775-776）發表了《俄羅斯漢學史》書評；在德國《東方文獻》（Bd.74, № 2, pp. 192-193）上也發表了 S. Behrsing 撰寫的關於該書的介紹；在日本松浦茂也曾撰文介紹該書。

33 В. С. Мясников, "Петр Емельянович Скачков",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962, №1, стр. 220.

34 Н. А. Кузнецова, Л. М. Кулагина,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1917-1967)*, М., 1970.

況，全面回顧了蘇聯時期東方學發展的歷程。

1990年，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從歷史學的角度，以檔案資料及重要史料為基礎，梳理從基輔羅斯最初與東方的瞭解開始直至19世紀60年代俄國東方學發展的各個階段，出版了《19世紀中期以前的俄國東方學史》<sup>35</sup>一書，該書全面再現了俄羅斯東方學積累資料、研究基本史料和有組織地形成東方學學科的全部過程，展現了這一時期俄羅斯東方學的主要學術觀點和學術流派。七年後的1997年，該所推出了《自19世紀中葉至1917年的俄國東方學史》<sup>36</sup>一書，該書以大量檔案材料為基礎，全景式地展現了俄國東方學發展的這一繁榮期，首次集中而系統地發表這一時期俄羅斯東方研究的全部資料，揭示出外交、軍事機構對這一時期東方學發展的作用。

1994年，俄羅斯科學院遠東所推出了作為俄羅斯漢學研究手冊的《俄國漢學》<sup>37</sup>一書，該書把漢學作為一個系統的學科，全面地介紹了獨立國協各國的漢學研究、敦煌學研究、滿學研究學者和研究機構。

## 五、結 論

斯卡奇科夫的學術風範對於俄羅斯漢學有著持續的影響。就是在編纂漢學書目、整理俄羅斯漢學史的過程中，斯氏接觸到涉及中俄關係的大量檔案文獻，萌生了整理中俄關係史系列檔集的設想。<sup>38</sup>自20世紀50年代後期，斯氏帶領剛參加工作不久的米亞斯尼科夫整理自1689年到1916年間中俄簽訂的條約，於1958年出版了《1689-1916年間的俄中關係：官方文件》，<sup>39</sup>由此開始了俄羅斯漢學檔案文獻整理的流派和以檔案文獻為基礎

展開研究的學風。此後在蘇聯，雖漢學研究機構幾經輾轉，但米氏堅持繼續整理中俄關係檔案，一些經驗豐富的檔案文獻專家如傑米多娃（Н. Ф. Демидова）、達維多娃（М. Б. Давыдова）、塔拉索娃（А. И. Тарасова）等也熱情地投入到這項工作之中。1969年，由當時為科學院通訊院士的齊赫文斯基（Б. Л. Тихвинский）主編，傑米多娃和米亞斯尼科夫整理，米亞斯尼科夫撰寫註釋和歷史導言，傑米多娃撰寫文獻導言的《17世紀俄中關係：資料和文獻》<sup>40</sup>出版。從那時起一直持續到現在的數十年間，俄羅斯漢學家系統整理中俄關係檔案，出版了17世紀至20世紀中俄關係檔案計12部，<sup>41</sup>時間跨度上涵蓋了四百年的中俄關係史，收入叢書中的不僅有俄文的資料和當時中國的官方正式語言——漢語、滿語、蒙語的資料，還有在17世紀至18世紀中葉在中俄關係中起仲介作用的拉丁文的資料，還有一些西方國家（英國、法國、荷蘭等）的外交資料，成為世界各國研究中俄關係的重要參考資料。隨著檔案文獻的整理，蘇聯漢學界對檔案資料的關注日益提高，從20世紀60年代至今以檔案資料為基礎的俄羅斯漢學研究，所積累的成就數不勝數。

綜上所述，斯卡奇科夫在俄羅斯漢學領域的成就，是20世紀初俄國東方學、漢學發展階段成果的一部分，體現了俄羅斯東方學學術傳統的傳承關係。同時正是在俄國東方學，特別是漢學教育的培養之下，成就了俄羅斯漢學史上斯卡奇科夫這個響亮的名字。處於20世紀初俄國社會巨大變遷之中、蘇聯時期獨特的人文語境之中的斯卡奇科夫，其本人就是俄羅斯漢學史的一個縮影，社會的變遷和意識形態所產生的影響，在他的生活、學術經歷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在他的身上，折射著蘇聯漢學家的苦痛與堅韌，反映著俄羅斯漢學的厚重與獨特。

35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М., 1990.

36 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с середины 19 века до 1917 года*, М., 1997.

37 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АН, *Российское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 М., 1994.

38 В. С. Мясников, *Квадратура китайского круга*, М., 2006. Кн. 2, Стр. 575.

39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689-1916: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Сост. П. Е. Скачков, В. С. Мясников. М., 1958.

40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17 ве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М., 1969. 該書中譯本《17世紀俄中關係》已於1973年在北京的商務印書館出版。

41 關於這套叢書詳見柳若梅譯，〈珍貴的中俄關係檔案史料〉，《國際漢學》第12期（北京：大象出版社，2005），頁300-303。